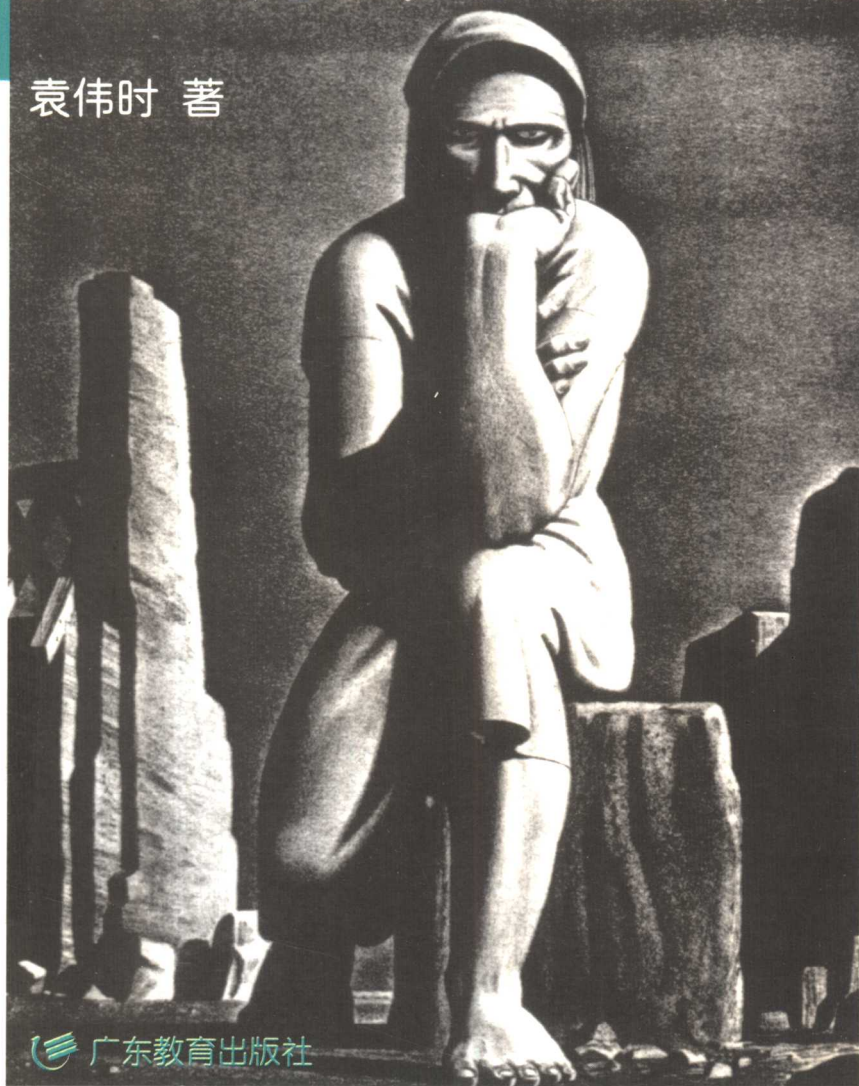


荒原学术文丛二

中国现代思想散论

袁伟时 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荒原学术文丛

中国现代思想散论

袁伟时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思想散论/袁伟时著.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8.8

(荒原学术文丛)

ISBN 7-5406-4005-7

I. 中…

II. 袁…

III. 中国-现代思想-散论

IV. B26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水荫路11号)

邮政编码: 510075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海市彩印制本厂印刷

(南海市桂城叠南)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75印张 287000字

1998年8月第1版 1999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001-5000册

ISBN 7-5406-4005-7/B·10

定价 16.1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致 读 者

——《荒原学术文丛》序

这里没有水，只有岩石
只有岩石，没有水，一条砂路
蜿蜒而上，绕进群山
……”

——艾略特：《荒原》

千沟万壑，白骨残垣，
诉说百年荒诞，千年坎坷。
岩巉苔滑路难行，
可有飞登捷径？
不屑随风上云端，
无意攀高附势。
冷眼睥睨，凿石斩棘，
险地放歌，谷底行吟，
别有豪情韵味。
鸦噪犬咬助兴，
荒原约会，
相顾一笑，
自由之最是心声。

袁伟时

1998年7月15日

目 录

自序：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1)
19 世纪中西哲学和文化交流的几个问题	(9)
“道同理一”论及其影响	(9)
第一个被介绍到中国的西方近代哲学家	(14)
中西文化互补和融合论的影响	(21)
儒学历史命运论纲	
——从 19、20 世纪看 21 世纪	(27)
走向困厄的几条途径	(27)
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建树	(28)
对新世纪的展望	(30)
魏源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开端	(32)
国门洞开前的传统哲学	(32)
传统哲学的发展趋势与公羊学的历史作用	(41)
华夏中心思想与对异文化的宽容	(45)
历史大转折中的迟滞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岭南文化	(47)
岭南文化范围如何界定	(47)
《海国图志》何以不是出自岭南人	(49)
开放与封闭交织的奇怪图景	(54)
岭南文化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58)
三岔分流的文化意蕴	
——洋务运动时期的岭南文化	(62)

康梁的求知经历说明什么	(62)
孙文的求学道路又说明什么	(64)
西学输入优势地位的丧失	(69)
官绅们可悲的文化取向	(73)
社会整合危机的开端	(75)
附录一 爱国主义·“革命路线”·学术研究	
——答李锦全教授	(77)
“误导”之一：近代岭南文化真相	(77)
“误导”之二：“非议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路线”	(85)
走上学术讨论的正轨	(92)
附录二 学术研究与讨论的基本准则必须遵守	
——再答李锦全教授	(95)
治学必先立德，学德的核心是不作伪	(96)
概念必须明晰	(102)
弄清基本事实，是讨论历史问题的基础	(106)
林乐知在华活动罪名辨	(111)
他究竟干了些什么	(112)
催人奋进还是诱人堕落	(120)
释几个误解	(127)
西化·现代化·政治家·知识分子	
——甲午战争百年祭	(139)
甲午战败的主要教训	(139)
政治家的畸形实践	(143)
知识分子的思维误区	(150)
慈禧、康有为的两面性及其启示	
——戊戌维新百年祭	(153)

从谁是罪魁祸首谈起	(153)
愚昧吞噬了生机	(157)
教主与维新领袖的内在矛盾	(164)
建立现代文化教育制度	(169)
《万身公法书籍》与康有为前期思想	(173)
疑难的由来	(173)
80 年代的追求	(175)
公车上书前的思想特点	(181)
甲午战后的巅峰	(184)
毕生上下求索的启示	
——梁启超与中西文化	(190)
中西结合	(190)
向西方学习什么	(197)
继承什么, 如何继承	(201)
严复思想遗产三问	(209)
严复与自由主义	(209)
严复与民族主义	(217)
为何有两个严复	(220)
晚清官员贪污的特点与根源	(234)
贪污受贿是晚清官场无所不在的风气	(234)
制度缺陷是贪污成风的主要根源	(237)
改革中的无序状态	(239)
专制主义的必然恶果	(240)
晚清四失机遇的启示	(243)
晚清的四次机遇	(243)
推行官办路线	(244)
坚持中世纪政治体制	(246)

吞下文化封闭的苦果	(248)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对抗”论献疑	(251)
谁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代表	(251)
“被污蔑的口岸华人”	(256)
政权与现代化力量的排拒与结合	(261)
《刑法》的变迁与 20 世纪中国文化的若干问题	(266)
一个奇特的历史现象	(266)
共同的现代性	(268)
创造性转化的开端	(279)
走出宗法关系罗网的曲折历程	(282)
历史的启示	(287)
从《盛世危言》到《人权论集》	(290)
大清帝国的病情和救治方案	(290)
自由知识分子的正义呼声	(293)
知识分子的历史承担	(296)
五四怨曲试析	(300)
历史的进步与价值观念的转变	(300)
反传统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302)
现代中国灾难重重的思想文化根源	(311)
胡适与所谓“中国意识的危机”	(313)
罕见的指责	(313)
“全盘西化”再咀嚼	(315)
“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献疑	(322)
与文化革命“密切联系”辨	(327)
“危机”来自何方?	(330)
章太炎与中国的民主主义	(333)
政治思想的基本性质	(333)

为何反对代议制	(336)
追求什么样的中国化?	(343)
罗素在中国	(347)
行程和讲学的基本内容	(347)
与新文化运动相呼应	(350)
中国之路与社会主义论战	(356)
中西文化观及其误解	(362)
深远的学术和思想影响	(368)
从《新事论》看冯友兰的文化观	(373)
从世界全局去理解中国文化问题	(373)
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376)
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	(380)
后记	(395)

自序：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又是一本评说 19、20 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书。这个研究对象也许是说不清、道不完的魔鬼三角，云遮雾罩，扑朔迷离，道德义愤，情感纠葛……中国人说百年中国事，真不知从何说起！

社会转型，文化转型，世界各国都在变，中国人的步履却特别艰辛。人们历数外来侵略者和宗法专制统治的罪恶，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如果不愿停留在这一步，就应进一步叩问：为什么腐朽的总是打而不倒，该生的总是生机不旺？罪恶与罪恶的消除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控诉前者无法说明后者。论及百年中国步伐迟滞最深层的原因，不能不正视支配历史行动主体的思想文化状况。

这本小书涉及鸦片战争前后至今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大小几十个问题。我坚持和追求的是：说真话，说自己的话。这是信念，又是目标。切实做点研究的大陆中国学人大概都了解，真要实践这极其平常的信念，必须面对意想不到的困难。

困难首先来自自己的知识不足。

19、20 世纪中国的史料浩如烟海，分散在海内外难以数计的图书馆、档案馆和个人手中，加上研究成果目不暇接，笔者自知学浅，提笔总有临深履薄之惧。因此，我只能把说真话放在极为有限的范围中：说自己所知道的，不说无根据的话，亦

不曲学阿世。对我来说，这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统一。

就中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来说，本世纪的 50~70 年代无疑是知识绝对贫困化的年代。通过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包括其序曲——批判胡风、胡适和最后的围剿——1958 年的“拔白旗、插红旗”），实现了两个打断：一是打断了大学的人文精神和学术自由的传统，原有的大学和大学教师被目为非整肃不可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载体。二是打断了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外国的学术、文化都成了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结晶，是“裹着糖衣的砒霜”。我们这些 50 年代初进入大学念书的青年，在两个打断中成了“以无知批有知”（创造社巨子和当时的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冯乃超的名言）的工具。随后，在封闭和以“思想统一”自傲的贫困学苑中，我们成了教学骨干，教出了一批又一批和我们一样贫困而自傲的学生。这一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观，其流风余韵至今仍历历在目。

尽管在教师思想改造和“拔白旗”的高潮中，我都奉命下乡，未能躬逢其盛，但也饱受这些文化氛围的熏陶，吸进和散发出不少“左”毒。随后因不愿当只能人云亦云的政策解释者，我情愿丢掉从本科念到研究生毕业的经济学，转向素所喜爱而自由空间较大（事后表明亦是文网颇密）的史学，所知甚少的痼疾就显得更加严重了。如果书中尚有若干可观之处，无非是勤以补拙的偶获而已。

困难还来自本国传统中缺少宽容。

“作之君，作之师”，以吏为师，政教合一；“群言淆乱衷诸圣”，以圣贤语录和经典为是非标准；一些假道学和文痞由是得以混迹其间假卫道之名营私害人；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传统。学术自由是舶来品，有时且是代价不菲的奢侈品，为此上

演的悲剧、惨剧不知凡几。要让整个社会学会宽容，真正尊重学术和学术自由仍须假以时日。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企求显示学术个性，很难想象会一路顺风。

困难更来自扭曲了的民族主义情结。

近代中国曾有过以维护国家独立和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为目标的民族主义。其贡献已永留史册。它的提倡者通常以民族自省为基本出发点，勇敢地揭示本国和本民族的落后，痛斥国民素质——国民性的低下和痼陋。不过，近代中国的历史也证明，民族大义或后人所称的爱国主义的内涵非常宽泛，各种人物和社会势力必然按照自己的利益和认识去阐释。占支配地位的是以传统的华夷之辨和天朝心态去看待中国和外国的一切，愚不可及地把揭露本国弱点、肯定别人长处视同卖国和汉奸行为。这个贻误 19 世纪中国的偏见在 20 世纪没有彻底消逝。“宗朱颂圣有成规”。民族自省、揭露发展障碍等知识分子理应履行的职责于此此时地变为不合时宜。尽管时至 90 年代如是思考问题之辈越来越少，本书却不幸留下了有关记录。

在当今世界，民族主义是个非常复杂的思潮。中国人普遍赞赏德国总理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遗址下跪的真诚忏悔；对日本政客不愿正视侵略罪行感到愤慨；为一些国家原教旨主义者的蠢行大惑不解。这些都显示了在民族主义浊浪泛滥中的清醒。可是，当事关本民族的时候，对一些出自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似是而非的语言，不少人却觉得非常顺耳！这正是没有从鸦片战争至义和团和文化大革命的奇灾大变中吸取足够教益的恶果。

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家国之恋是人之常情。但知识分子是历史和现实的守望者，一旦进入学术领域，他必须冷静客观地观察和思考一切。罗素有句名言：“使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可能屈服的最有趣而又最有害的错误之一，就是

想象自己乃是‘神圣意志’的特种工具。”^① 彻底摆脱义和团和
红卫兵情结，这是中国人必须清偿的思想欠债。

一个不应忘记的历史事实是：蒋介石实行法西斯独裁专制
统治，举的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大旗。法国思想家利
奥塔说得好：“当我们说民族的时候，很难确切地说清楚我们讲
的是哪一种身份。当我们把民族，das volk（人民），放在规范性
实例的位置上的时候，不可能说清楚被呼唤的权威是专制主义
的——召唤起源叙事的传统——还是共和主义的，或诉诸于依
据自由理念所制订的系统的审议制度。”^② 政客、学者、文人无
不按照各自的观念去使用民族、人民这一类语言。如果不加分
析，个人上当受骗尚属小事一桩，煽动千百万群众在民族、人
民的名义下践踏文明、民主、法治乃至仇杀无辜，其后果便不
堪设想了。而这在中外历史上都屡见不鲜。

最大的困难则来自几个理论问题的反思。

一是世界现代文化的共同性与差异性。

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在议论的问题。反文化霸权、东方主义、
多元主义、亚洲价值……海内外都在谈论这些话题。有些提倡
者用心良苦。但这些主张的内容本身却有许多可疑之处，其中
有些是值得人们一再深思的。例如，现代文化有没有普世适用
的现代性？如果离开了国际社会认可的现代性，那些文化能叫
现代文化吗？古往今来，文化都有民族和地区的差异，但就现
代文化而言，其差异大体是风俗习惯或形式的，还是对现代性
基本内容的修正？目前一些政治家和学人自炫的独特价值，是
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可以接受但有待克服的滞后观念，

① 《论历史》，三联书店 1991 年北京版，123 页。

② 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184 页。

抑或是对既存现代性弊端的救治和恰当的修改？

这些问题的回答包含着深刻的理论内容，但更重要的是应从社会的和历史的实际中去寻找答案。本书的某些篇章为此作了粗浅的尝试。

另一重大理论问题是来自后现代思潮的挑战。

流行着多种后现代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统一的界说。有一种主张是把后现代界定为“针对元叙事的怀疑”。因此，各种宗教和政治的终极理想和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看不见的手等等，都是应受质疑的元叙事。^①与这些相联系的启蒙、理性亦属过时概念。

本书肯定鸦片战争以来的各种现代性，即上述被质疑的元叙事。那么，在后现代理论的观照下，这些论述是不是也属过时了呢？笔者无意卷入有关后现代思潮的争论，对本书涉及的问题，却有一些想法。

第一，不能脱离社会历史环境去评论思想文化观点。

19、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前现代。这个历史条件决定了现代性的无法否定的价值。低估乃至无视这个现实条件，可能在貌似公允中步入迷宫。

第二，历史不自今天开始。

后现代思潮主张多元，反对一元化简。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恰恰是现代文化的基本观点，且已成为现代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侵犯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在现代社会是不能允许的暴行，早已被有现代素养的公民唾弃。

又如，自由有其限度，理性亦有其边界，高调民主、积极自由可能转化为暴政，这些都是远在后现代思潮兴起以前已被

① 王宾：《后现代在中国的命运》，未刊手稿，14页。

广泛传播的思想。140多年前，托克维尔在其剖析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史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那些明天就将成为牺牲品的人……他们以为，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无震撼地对如此复杂、如此陈旧的社会进行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这些可怜虫！他们竟然忘掉了他们先辈四百年前用朴实有力的法语表达的那句格言：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在寻求过大的奴役。”^①而在19世纪曾为自由、民主、理性……设限的思想家为数不少。进入20世纪以后，这类思想仍在传承和拓展。其中最杰出的又是现代性的最坚决维护者：“对‘理性’和‘明智’的最恰当解释是向批判开放，即随时准备接受批判和渴望自我批判。”^②

基于上述状况，笔者赞赏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利奥塔的一个观点：就其合理因素来说，“无疑，后现代是属于现代的一个组成部分。……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现代主义的末期，而是现代主义的初始状态，而这种状态是川流不息的。”^③切断思想发展的源流，藉以抬高某一流派，显然是不足取的。

第三，怀疑者应受怀疑，呼吁设限的必须设限。

中国后学的提倡者喜欢援引利奥塔的一句话：“我将后现代定义为针对元叙事的怀疑态度。”^④笔者非常赞同王宾教授的一段精彩论述：“宽容，以怀疑自己为前提；否则，多元化就会变成另一种元叙事神话。历史不断证明：任何虔诚的理想主义者，只要他不知、不愿或不敢怀疑自身元叙事的合法性并为之划界

① 《旧制度与大革命》，179页。

② 《波普尔思想自述》，158页。

③ 《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207页。

④ 《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26页。

设限，一旦拥有了权力，包括话语权，就会成为践踏他人理想的独裁者。”^①补充一句话也许不无好处：后现代主义的元叙事同样必须受到质疑和设限。这是上述论断的必然延伸。

一个根本问题是语境。

有的后现代思潮鼓吹者直截了当地断言，肯定源于西方的现代性的价值，就是“宣布了中国的永恒的‘他者’的认同与臣属的地方”，并借用别人的话讽喻其实质是“将殖民主义合法化”。愚意以为说这些话，有忘记了19、20世纪中国的历史教训之嫌。不管论者的主观意愿如何善良，这些话不过是重复了晚清昏聩权贵不准“以夷变华”，否则就是背叛祖宗，有辱天朝上国的训示。论者甚至无视至今仍历历在目的场景：由于抗拒他所说“完全按照西方式游戏规则来运作”的市场，中国人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而被中国人拒诸门外的又何止市场一项！

19、20世纪中国曾一再遭受强敌欺凌，卫道的语言特别容易煽情，而学术和理论争论需要的却是具体和冷静。有的后学鼓吹者一再否定自由、民主、人权、进步、科学、理性……等来自西方的现代性，却没有具体说明自己要提倡什么。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缺陷。论者是主张反对还是限制或修改这些现代性？如是前者，则须进一步说明它如何利国利民。如果是后者，又是如何限制或修改，并与众不同，绝非来自西方而让“殖民主义合法化”的？离开这些具体的语境，正常的讨论是难于进行的。

伴随这本小书的有艰辛，但更多是来自众多读者（从同行方家到普通工人）的理解和支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向合

^① 《后现代在当代中国的命运》，未刊稿15页。

格的现代公民蜕变。他们渴望了解昨天的真实，补行告别中世纪的洗礼。我的笔是献给他们的。

1997年6月12日于广州中山大学